

# 母子墩墓青铜器及有关问题探索

肖梦龙

1982年9月出土的江苏丹徒县大港母子墩墓青铜器群，是江南地区（按：指苏、皖南部，下同）商周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众所周知，宜侯矢簋的长篇铭文对江南古史的研究起到过突破作用，母子墩墓与烟墩山宜侯墓相近，其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文试对这批青铜器及其反映的一些问题作些分析探讨，以求教于同志们。

## 一 母子墩墓青铜器产地分析

在江南地区，解放以来陆续发现过一些周代铜器，大多出自墓葬，个别出于窖藏。主要包括：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sup>①</sup>、大港磨盘墩西周墓<sup>②</sup>、仪征破山口<sup>③</sup>、江宁陶吴镇<sup>④</sup>、南京浦口<sup>⑤</sup>、溧水乌山一、二号墓<sup>⑥</sup>、丹阳司徒西周铜器窖藏<sup>⑦</sup>，以及安徽皖南屯溪墓等<sup>⑧</sup>，另外还有一些零星发现<sup>⑨</sup>。这些出土于江南的青铜器，可分为两种产品类型：一种是中原铸器，以宜侯矢簋和屯溪一号墓的“父乙”尊、仪征破山口铜器群中一件铸铭铜鼎（已残碎，现存扬州博物馆，铭文内容不清）为代表。这类器物在形制纹饰等方面与中原的习见流行器无所区别，是从中原传入江南的，在江南出土青铜器中所占比例极小。另一种是地方产品，江南发现的绝大部分青铜器均属此类，为江南青铜器的主流。

江南地方铸造的青铜器在造型、纹饰风格上均有两重性，即一方面与中原同时期青

铜器保持着基本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地方个性。母子墩墓出土的青铜器，典型地反映了上述情况。

母子墩墓的双鸟耳方座簋，同宜侯矢簋一样是当时周人传带来的中原铜器，该墓其它器物皆属地方铸造。它们间的区别为：

（1）铜质不同。外观上看，双鸟耳方座簋呈浅绿色，除锈后胎质橙黄；而其它铜器色泽偏暗，除锈后胎质青灰泛白。这与它们的合金成分不同有关。经对双鸟耳方座簋和另外几件青铜器作激光显微光谱定性分析，结果如表一。

为进一步分清江南铜器与中原铜器在铜质上的差异，我们对近年江南土墩墓中出土的整坛随葬的青铜块<sup>⑩</sup>，也作过光谱及化学定量分析，结果见表二、表三，可与这次母子墩墓青铜器的分析结果相互参照。

以上几方面的分析结果表明，江南青铜器的含铅量都较高，属铅青铜，中原同时代青铜器则为锡青铜，二者是有区别的。

（2）在冶铸技术上虽都为通体合铸法，但江南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一般较差，不如双鸟耳方座簋那样精美。方座簋圈足底面带有铸范的方格线纹，是中原铸造铜器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如淩县辛村所出之簋<sup>⑪</sup>，甘肃灵台县西岭西周墓铜簋<sup>⑫</sup>，以及河南鹤壁庞村出土涡纹鼎<sup>⑬</sup>等中原铜器上均有之，而这在江南铜器上是没有的。母子墩墓铜器中的炊器如鼎、鬲，通体范痕未经打磨修饰即行使用，

表一： 母子墩墓青铜器激光显微光谱定性分析

测件名称	主 量	较 多 量	微 量
双鸟耳方座簋	铜	锡、硅	铅、铁、镍、砷、铋
云形鸟纹鼎	铜	铅、铁、砷	硅、镍、锡
雷纹鬲	铜	铅、铁	镁
矛	铜	铅、锡、铝、硅	砷、镍、铁、铋

江苏省理化测试中心

表二： 金坛墅墩青铜块光谱半定量分析

成分 含量	铜	铅	镍、银、锡、铋、铈、钙、铬、铝、 铁、硅、镁、锰、钴
%	>50	30—50	微 量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表三： 金坛墅墩青铜块化学定量分析

成分 含量	铜	铅	硫	锡	砷	锡
%	58.83	39.16	0.165	0.075	0.73	痕 量

北京钢铁公司中心化验室

表面显得比较粗糙，暗然无光，这些也是地方性特点之一。

(3) 双鸟耳方座簋的造型庄重，纹饰深饕餮细刻，以云雷纹为地，主题花纹上再刻花纹，形成三层花，工整繁缛，一丝不苟，技艺精湛，给人一种威严富丽感，为同墓其它铜器所不及。其它铜器另具一格，造作多单薄轻巧，花纹装饰粗犷简练，不施地纹。

(4) 双鸟耳方座簋铸有铭文，这在中原青铜器上司空见惯；但西周时期的江南青铜器皆不见铭文，构成江南青铜器的又一地方特点。这可能是偏居江南的土著贵族虽亦仿效中原奴隶主阶级铸造各种青铜礼器，但他们却被周王朝视为蛮夷，很难得到什么封赏而特地刻铭“永宝”，因此当地铸造的一些青

铜器仅为实用而已。鼎、鬲器底满积烟炱和带有修补斑痕，足见其长期使用。

通过以上对此墓出土的双鸟耳方座簋和其它青铜器分析对比，基本上可以认定，母子墩墓出土的青铜器，除方座簋是中原铸器外，其它均应是地方产品。

## 二 江南青铜器的造型特征

母子墩墓江南青铜器的形制在基本保持与中原同类器物一致的前提下，又有多方面的变化，有的表现为器体某部位上的差异，有的则完全是江南特有的。如铜鬲为直口平沿，腹壁竖直，与中原的侈口、束颈、鼓腹鬲形制迥然不同，而与湖熟文化中的瘪状高弧裆锥形袋足

陶鬲极为相似<sup>④</sup>。双兽首耳簋，唇沿细卷，口至腹成直筒形，与同时期中原簋的侈口、翻沿相异。提梁卣的盖及夔梁端牺首的造型也与中原同时期同类器不同。中原卣盖皆作拱形，上有圈状握手，左右“犄角”为早期特征；而母子墩墓卣盖面斜直，省去“犄角”，盖提手铸作小鸟形，别有意趣，在中原铜器上未见。夔梁端牺首同过去江南地区出土的几件卣一样作牛头状，而同时期中原卣的提梁牺首一般呈羊头形。鸳鸯形尊，取材于江南水乡的鸳鸯，造型奇特优美，在中原鸟兽尊类中是没有的，是江南青铜工匠们独特的艺术创造。飞鸟盖双耳壶，从生动别致的飞鸟盖设计，到整个壶体形态，都和中原流行的圈盖、细长颈、鼓腹、贯耳壶完全

两样。铜矛釜口端作成长长的两尖叉形，这种双叉式釜也见于当地有的青铜工具如斧头上<sup>⑤</sup>，有着强烈的地方特色。

在过去宜侯墓及屯溪一号墓出土铜器中，发现过一些江南特有的器物如角状器、五柱器等，对其名称和用处很难解释。这次母子墩墓出土的一件叉形器亦属此类。它在墓中和铜矛放在一起，并带有铤，可能是一种兵器。也有的同志认为此叉叉股向内弯曲，又尖圆秃无锋，显然不能作为刺杀之用，似为仪仗器。究竟作何用途，尚待研究。

### 三 江南青铜器纹饰上的浓厚地方色彩

江南青铜器在纹饰上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从母子墩墓的江南青铜器纹饰来看，它虽吸取了中原铜器的部分花纹图案，但大都经简化、变体，同时较多地采用了南方陶器上传统的几何形纹样。根据不同器物 and 不同装饰部位，灵活地构思布图，从而形成自己纹饰上的崭新风貌。

母子墩墓出土的双兽首耳簋，其腹部主体纹饰仿照中原铜器流行的饕餮纹，但已简

化，不施地纹；颈部及圈足均饰地方特点的几何形勾连纹，颈部中间所附饰浮雕牺首作蝴蝶形，别出心裁。云形鸟纹鼎上一周饰简化变体的垂冠长喙鸟纹，线条粗犷，与溧水乌山一号墓出土铜鼎所饰线条组成的简化变形饕餮纹相同，已失去它原有的神秘、威严的风格<sup>⑥</sup>。此鼎的云形鸟纹间附饰三个突出“卩”形纹，也显然是仿中原铜器上附饰的牺首，并予以简化变形。同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铜鬲雷纹间的三个“卩”形纹。从这一点上看，江南铜器的花纹装饰比较自由，框框较少。

以上所述这些以线条形式组成的各种几何形纹饰，在江南铜器上比较常见，它充分利用几何图形的多变性，勾画出丰富多彩的花纹形态，如江南其它地点出



图一 1—5.方雷纹(1,2.母子墩墓铜鼎、铜鬲; 3.南京安怀村遗址陶片; 4,5.南京北阴阳营遗址陶片) 6—8.云纹(6.母子墩墓飞鸟盖双耳铜壶; 7,8.南京北阴阳营、锁金村遗址陶片) 9.圈点纹和细绳纹相间的圈点纹(母子墩墓铜提梁卣) 10.圈点纹(丹徒蒋家山遗址陶片) 11—15.绳纹、圈点纹(江西吴城遗址陶片) 16,17.螺旋纹和折线纹(母子墩墓车舌、节约) 18.折线纹(南京北阴阳营遗址陶片)

土的铜器上还有云形夔纹、“C”形云纹、环云纹以及尖叶勾连纹等等。这类纹饰一般早期的单位比较长，线条粗疏流散，作浮线雕式；晚期的单位短小不易分辨，构图繁密，线条纤细，有的还带有芒刺。

此墓雷纹鼎和铜鬲上的方雷纹，提梁卣圈点纹及细绳纹相间的圆点纹，飞鸟盖双耳壶的云形勾连纹图案，以及车马器件上的折线纹和螺旋纹等，与南方商周时期几何印纹陶纹饰相同。陶器上几何印纹的固有单元在以上铜器上表现得很清楚（图一），铜器纹饰显然是从几何印纹陶纹移植的。在花纹装饰上较多地运用几何形图案，是江南青铜器纹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

值得指出的是，江南青铜器在纹饰的布局上，也颇具特色。如铜鬲腹部作两周条带状雷纹的装饰形式，别开生面，为中原及其它地区所不见。飞鸟盖双耳壶的纹饰布局，更有独到之处。通常所见中原壶一类高体器物为纹饰，一般皆采取由上而下的分层式；但此壶则不然，而是用凸素条带附加方钉纹作间界，大刀阔斧地将壶体纹饰竖分作四组。每组内运用粗犷豪放的刀法满刻大朵的云形勾连纹图案，而各组的云形纹形状又横竖不一，互不对称，流而不乱，疏而不散，主题突出。在造型独特的飞鸟形盖映衬之下，显得很有气势，有相当强烈的装饰效果。

#### 四 结语

历史文献记载，商代末年周太王（即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出奔荆蛮，创立国家，“自号勾吴”。1954年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出土矢簋上一百二十余字的铭文，印证了此说的可靠性。正如唐兰先生所指出的：

“过去有些人曾经怀疑吴国不是周的同姓，怀疑周王的势力不能达到吴地等等，由于这个簋的发现，使古书上这一部分的史料复活了。”<sup>⑩</sup>仲雍的曾孙，吴国第五代君主周章“在武成之间封为虞侯，隔三十多年到康王

时封为宜侯”<sup>⑪</sup>。虞即吴，虞侯也即是吴侯。郭沫若与唐兰一致考定：“宜”的地望，应“在今丹徒附近”<sup>⑫</sup>。母子墩铜器墓在此地的发现，又充实了这方面的考古材料。

母子墩墓的双鸟耳方座簋，器内底铸有“伯乍宝尊彝”五字铭文，或可称为“伯簋”。铸这类铭文的铜器，在陕西周原一带出土较多<sup>⑬</sup>，一般认为“伯”字系表明主人身份的省称。此墓的有铭铜簋，当和宜侯墓的矢簋一样是吴国的周族统治者带来的，母子墩墓主也应是外来周人。再结合此墓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青铜器随葬品，其墓主在吴国的地位无疑是相当高的。

经近年来的调查，在镇江以东的丹徒至丁岗、大港一带分布有较多的这种大型土墩墓。宜侯墓封土墩早年被平，实际上和母子墩墓一样为江南地区所普遍流行的土墩墓。这一带应是早期吴国统治的中心区域。

江南地区的土著先民们，自原始社会以来就流行着一种“不挖墓穴，只将死者置于地面，用土掩埋”的特殊葬俗<sup>⑭</sup>，如北阴阳营、圩墩以及草鞋山等新石器时代的几处重要遗址墓葬都是如此。至商末周初吴国兴起以后，这一地区的传统埋葬习俗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只建坟堆而不掘墓坑的“土墩墓”。至今发掘清理的土墩墓已有百余座，但多为中小型墓葬，大型土墩墓，特别是可确定墓主是中原来的周人的墓葬，目前除烟墩山宜侯墓以及屯溪一号墓，就是这次发掘的母子墩墓了。这类大墓的封土墩宏伟，现存底径都在30余米、高5米以上。在随葬品中除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外，主要是成套的青铜礼器。青铜器皆包括中原铸器和地方产品两部分，在中原铸造铜器上往往有铭文，标志着墓主身份。一般中小型土墩墓的随葬品虽也较丰富，但均为地方色彩的各种陶瓷器，铜器数量不多，有之也全是地方产品，这类墓葬可以溧水乌山一、二号墓为代表，其墓主当属江南的土著贵族阶层。由此

可见,无论是当地权贵,还是来自中原的吴国统治者周人,皆卒葬土墩墓。土墩墓成为当时当地一种统一的葬俗,反映了周人与当地人民的融合。这与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也是相符的。史载太伯、仲雍奔荆蛮后,“文身断发”,“为夷狄之服”,随同蛮俗。这些当然很难从考古材料上得到直接证据。但如从周人死后亦随土著习俗埋葬土墩墓的情况来看,“文身断发”、“为夷狄之服”应当是事实。这些从北方来的,本以农立国的周人,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与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传授荆蛮,博得荆蛮族人民的信赖和拥戴。史载“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数年之间”江南一带出现了“民人殷富”的发达兴旺景象,对江南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有的同志推测太伯、仲雍奔吴“是为征服而来。既可‘征集’,当然也可讨‘伐荆蛮’,太伯是作为胜利者而君临吴国的”<sup>②</sup>。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军事优胜者,对于“非我族类”的战败者,一般来讲,要么灭绝,要么整族降为奴隶。在战胜者的经济、文化水平明显高于战败者的情况下,战败者传统的文化习俗不可能得到尊重和发扬。众所周知,当时华夏族(包括周人)的经济、文化水平比被华夏族视为蛮夷的荆蛮族要高得多。因此,假如太伯、仲雍君临吴国是“武力征服”的结果,见诸考古学文化遗存上的将不会是目前这种情况,而是象后来楚灭吴、越之后那样,江南持续千年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一蹶不振,从周初兴起的土墩墓也被楚人的竖穴棺槨墓所取代了<sup>③</sup>。因而,太伯、仲雍奔吴,是以周人的先进生产技能为后盾,在变服、从俗的策略之下,得到荆蛮人的拥戴,和平地成为荆蛮族的统治者。

- ① 江苏省文管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及附葬坑出土的小器物补充材料》,《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
- ② 《丹徒磨盘墩遗址发现一座西周墓葬》,《新华日报》1982年11月11日第1版。
- ③⑤ 王志敏、韩益文:《介绍江苏仪征过去发现的几件西周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尹焕章:《仪征县破山口探掘出土铜器记略》,《文物》1960年第4期。
- ④ 李蔚然:《南京发现周代铜器》,《考古》1960年第6期。
- ⑤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浦口出土一批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 ⑥⑥ 镇江市博物馆、溧水县文化馆 刘兴 吴大林:《江苏溧水发现西周墓》,《考古》1976年第4期。镇江市博物馆 溧水县文化馆:《江苏溧水乌山西周二号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二辑,1978年。
- ⑦ 镇江市博物馆 丹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 ⑧ 殷涤非:《安徽屯溪西周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 ⑨ 刘兴:《镇江地区近年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五辑,1981年。
- ⑩ 镇江市博物馆、金坛县文化馆:《江苏金坛暨墩西周墓》,《考古》1978年第8期。
- ⑪ 郭宝钧:《浚县辛村》35页,图版陆貳:5,科学出版社,1964年10月。
- ⑫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灵台县文化馆:《甘肃灵台县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 ⑬ 周到、赵新来:《河南鹤壁鹿村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三辑,1980年。
- ⑭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徒葛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探掘记》,图版貳:10,《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 ⑰⑱ 唐兰:《宜侯矢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 ⑲ 郭沫若:《矢簋铭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 ⑳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0年。
- ㉑ 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
- ㉒ 梁白泉:《太伯奔吴说》,《南京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
- ㉓ 镇江市博物馆:《江苏武进孟河战国墓》,《考古》1984年第2期。